



# 文化介入与 翻译的文本行为研究

魏瑾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 2008 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介入与汉英翻译的文本行为研究》(项目编号:08YBB329)的最终研究成果

# 文化介入与翻译的 文本行为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内容提要

本书以全球文化语境为背景,以现有汉英翻译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汉英文化视角,对翻译的文本行为进行研究。按照文本实证和理论研究相互应照的思路,通过文本的个案分析,重点对译者在实施文本行为具体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制约及其所采取的文本策略进行研究,从语言、文化互动的层面去探讨翻译中的文本取向和文化取向问题,研究如何在文本与文化目的之间寻求最佳契合。本书适合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者、大学教师、外语专业研究生、本科生及翻译爱好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介入与翻译的文本行为研究 / 魏瑾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313-05913-0

I. 文… II. 魏… III. 英语—翻译理论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3810 号

## 文化介入与翻译的文本行为研究

魏瑾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96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54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200

ISBN 978-7-313-05913-0/H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文本一直是翻译研究的对象与翻译批评活动中的价值客体，是译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传统的翻译研究始终没有走出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樊篱。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翻译的文化取向将研究者的目光拉向了翻译活动所置身的广阔的历史和文化空间。英国学者哈蒂姆和梅森在其著作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中将翻译界定为“一定社会语境下发生的交际过程”。在1988年出版的《翻译学：一门综合学科》专著里，德国翻译学家玛丽·斯内尔·霍恩比以格式塔（gestalt）的整体研究法为基础，提出了翻译不是语际转换（interlingual transfer），而是跨文化转换（cross-cultural transfer）的说法，主张将文化作为翻译的背景，用文化填补语言学和文学翻译之间的空隙。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和美国学者安德·勒菲弗尔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cultural shift）的发展方向（Bassnett, S. and Lefevere, A., 1990），他们甚至认为翻译单位也已开始“从词到文本，从文本到文化迁移”。在《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一文中，巴斯内特把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联系起来，认为翻译研究已向文化转向，文化研究向翻译转向的时候已经来临（Bassnett, S. and Lefevere, A., 2000）。近二十年来，国际翻译界出现的文化转向同样波及到中国，它首先出现在学者们对于如何处理源语文化，是否需要文化传译方面的争议之中。有的学者从接受理论出发，认为源语和译语因文化差异而不能通达时，“要用译语文化替代原语文化”（穆雷，1990）。另有学者从文化交融的目的出发，认为一味地归化，囿于传统心理和语言习惯，必然

会截断文化交融（吴泽林，1988）。孙致礼先生也在其《文化与翻译》（2000）一文中明确提出在翻译实践中进行文化传真的观点。谢天振先生（1999，2000，2003）则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角度，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文化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日益深入。翻译研究的中心经历了一个从作者到文本再到译者和读者的过程，当代翻译研究以译者或读者为中心的文化研究范式将局限于文本的研究范围扩展为超文本的范围，将翻译过程从语符转换过程扩大为文化交流和文化构建的过程。从文化的视野来关照整个翻译活动，这是目前翻译研究发展的主要趋势。然而，随着文化转向之深入，翻译学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宽，不少关于文化翻译的论述和见解都超越了语言和文本，混淆了翻译的政治目的、文化目的与翻译的文本目的，从而影响翻译研究的纵深发展。马乐梅（2002）指出，翻译的终极目标是传播文化，但它是通过一个个文本来实现的，译者的直接目的是文本。文本的内容、形式本身就是文化，而文化也只有借文本才得以体现。文本的性质、译者的目的都影响文本中文化因素的处理。曹明伦教授（2007）在其著作中区分了翻译的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并提出翻译之文本目的乃译者的根本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实施翻译的文本行为。这一提法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是翻译研究中尚有待加深和拓宽的课题。王东风（2007b）指出，就翻译研究而言，解构主义迫使我们把专注的目光从意义或所指的确定性转向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能指的历史性，从文本之内转向了文本之外：从文本的静态分析，转向了文本生成与接受的动态成因；从文本的语言分析，转向了与文本传播有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当主流翻译研究都走向了文本之外的时候，我们不难想象，它迟早还要回来。因为，语言和文本毕竟是翻译的根本属性。从语言和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回归，一种必然的回归，翻译的栖息地毕竟离不开语言，离不开文本，离不开结构。但这种回归已不是简单的回归，因为我们毕竟已经出去过，已经看到了文本之外的大千世界及其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认为，一方面，翻译

过程也是一种文本形成的过程,文本是作为工作主体的译者的处理对象。翻译的表现总是从文本出发,经过译者,最终又归于文本。另一方面,文本并非是一系列文字的简单组合,而是负载外来文化因子的载体,它必须满足一定的文本性(textuality),也就是复杂的语言对象在反映特定社会和交际制约时所具备的一系列特征。文本产生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不可能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事实上,每个文本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一些文化因素。因此,翻译不仅是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活动,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信息转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受到文本的约束,而且还受到各种各样文本外因素的制约。正如刘宓庆(2007: 72)强调的那样,翻译研究必须将文化翻译与意义和形式同时挂钩。因为,文化是意义的一部分,形式又是表意的手段。文化翻译是翻译中意义转换的一部分,二者密不可分:忽视文化来谈意义必然导致谬误。因此,如果只限于纯语言的文本分析和文本再现而缺乏文化观照,翻译研究必将走向狭窄封闭的死胡同;相反,脱离文本,忽视语言的泛文化研究必定脱离翻译研究的轨道。本书主要沿着这一思路,结合当前的文化语境,探讨汉英翻译中文化介入与文本行为问题,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文化介入翻译过程研究。本书研究课题中的“文化介入”特指干扰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选择的“文化因素”或“文化参与”。翻译是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交流与转换,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社会文化对翻译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对翻译的方式、翻译的取向有着各种制约和调节,翻译与社会文化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翻译研究的视点也应从语言文本转向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即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与制约作用。二是文化观照下的翻译文本行为研究。就翻译而言,我们所说的文本,是指狭义的文本,即语言层面上的文本。既指源语文本,又指译本。本书所指文本行为主要是指在翻译进入文本阶段时,译者在实际的文本操作上,是如何处理的。翻译的文本行为包括译者解读原文文本、确立和重构文本话语意义以及再现原文文本的方式与策略。文本意义的确立既受制于受众个人的“文化符码”,又受制于受众接受文本时的文化语境,文化因素

总是或多或少介入翻译的文本行为而使翻译的文本目的难以充分实现。本书试图结合具体翻译实例,进一步探讨翻译的文本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全书分九章进行论述。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从宏观层面对翻译的文化研究进行梳理和概括。第二章以中国翻译史为个案研究,通过中国翻译史上的几次高潮,分析探讨翻译的文化政治性。继而在第三章提出翻译的文化考量,探讨全球文化时代翻译的文化输出战略。第四章通过从审美、宗教、伦理、政治与意识形态几个方面对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进行深入分析。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从文化视野下探讨翻译的伦理问题和翻译的间性特质。最后三章主要基于文化视角对翻译的文本行为进行研究。第七章对译者的文化自觉与翻译文本行为进行探讨。译者是两种文化的沟通者,译者的文化身份的自觉与主动是跨文化传播达到预期目的的重要前提,不仅决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编码、解码的方式,而且还决定译者采取何种策略传递文本信息内容,译者的文化个性渗透在译作之中。第八章对翻译文本解读中的文化阐释进行探讨,并对文化误读进行辨证的分析,探索文本理解与文化语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文内走向文外的文本解读策略。第九章首先对文化翻译策略进行宏观探讨,接着提出文化翻译的具体方法并进行简单评析。本研究主要以哲学阐释学、翻译学、文学文本理论、文化批评及语言学等为理论基础,按照文本实证和理论研究相互应照的思路,通过文本的个案分析,重点对译者在实施文本行为具体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制约及其所采取的文本策略进行研究,从语言、文化互动的层面去探讨翻译中的文本取向和文化取向问题,研究如何在文本与文化目的之间寻求最佳契合。具体方法包括比较研究、宏观和微观结合研究、整体与个案相互借鉴研究等。本书试图融合文化翻译与文本理论的研究成果,从汉英文化视角,对翻译的文本行为进行探索,在理论探讨的同时,辅以适当的例证评析。笔者期望本研究得出的结论能对汉英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描述和解释力,对构建翻译的文本理论和文化翻译理论做出有益的贡献。由于笔者学识有限,书中还存在许多缺憾,比如,对所探讨的部分议题,总结综述多,提出新见少,有的问题研究还不够深入,浅尝辄止。笔者

认为，翻译行为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介入翻译文本行为研究应该紧跟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最新步伐，还应该紧密关注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将翻译文本行为研究、文化研究与翻译学发展前沿紧密相连，并用文化介入翻译文本行为的研究成果指导汉英翻译实践。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绪论                | (1)  |
| 第一节 翻译与文化             | (1)  |
| 第二节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 (4)  |
| 第三节 文化翻译研究概述          | (8)  |
| 第二章 从中国翻译史看翻译的文化政治性   | (14) |
| 第一节 早期的佛经翻译活动         | (14)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 (18)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         | (21) |
| 第四节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       | (27) |
| 第五节 建国以后至文革时期的翻译      | (31) |
| 第六节 改革开放后的翻译          | (34) |
| 第七节 小结                | (35) |
| 第三章 全球化时代翻译的文化战略观     | (38) |
| 第一节 翻译的文化考量           | (38) |
| 第二节 文化输出战略            | (41) |
| 第三节 翻译的全球本土化视角        | (47) |
| 第四节 跨文化翻译：自我与他者互动     | (52) |
| 第五节 和而不同：传统文化思想对翻译的启示 | (56) |
| 第四章 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        | (61) |
| 第一节 审美文化干涉            | (61) |
| 第二节 伦理、宗教文化干预         | (66) |
| 第三节 政治与意识形态介入         | (69) |

|                              |       |
|------------------------------|-------|
| 第五章 文化视野下翻译的伦理思考 .....       | (80)  |
| 第一节 忠实与对等: 传统翻译伦理预设 .....    | (81)  |
| 第二节 尊重差异: 当代翻译伦理诉求 .....     | (85)  |
| 第三节 翻译伦理的理论探讨 .....          | (88)  |
| 第六章 翻译的间性视角研究 .....          | (97)  |
| 第一节 翻译的主体间性 .....            | (98)  |
| 第二节 翻译的文本间性 .....            | (111) |
| 第三节 翻译的文化间性 .....            | (120) |
| 第四节 结语 .....                 | (127) |
| 第七章 译者的文化自觉与翻译文本行为 .....     | (128) |
| 第一节 文化视野下译者的主体性 .....        | (128) |
| 第二节 译者的文化身份 .....            | (131) |
| 第三节 译者的文化态度与文本行为 .....       | (135) |
| 第八章 基于文化视角的翻译文本解读 .....      | (144) |
| 第一节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 .....          | (144) |
| 第二节 文本阅读与跨文化的文本理解 .....      | (154) |
| 第三节 文本的文化阐释 .....            | (166) |
| 第四节 翻译的文化误读 .....            | (176) |
| 第五节 文本理解与文化语境: 从文内走向文外 ..... | (187) |
| 第九章 汉英文化翻译文本表现策略 .....       | (196) |
| 第一节 宏观翻译表现策略 .....           | (197) |
| 第二节 文化翻译的具体方法 .....          | (229) |
| 附录 李杜诗歌的人文意蕴与英译策略 .....      | (240) |
| 参考文献 .....                   | (250) |
| 后记 .....                     | (274) |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翻译与文化

季羨林先生认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如果有往来，有交流的需要，就会需要翻译。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季羨林，许钧，1998）从语言学层面来讲，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上，它已经成为信息交换和人际交流的主要手段。从文化研究的意义上讲，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是文化阐释和再现的主要手段，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That complex whole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custom, and any other cap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ired by man as a member of society.）”（Keesing, 1958: 18）后来，拉里 A. 萨默瓦（Larry A. Samovar）等人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将文化阐释为“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意指方式、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功能、空间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文化表现为一定的语言模式和行为方式……同时也涉指并受限于在共同生活中起实质性作用的物质存在。……而且，文化是持续

的、恒久的和无所不在的，它包括了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所接受的一切习惯性行为。文化在外面的物质环境中同样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包含并说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刘宓庆，2007：2）《辞海》（1979：1533）对文化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霍尔（Hall，1976/1977：16）曾说过：“人类生活中还没有哪一方面是不受文化的影响，不被文化所改变的。”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地植根于语言，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从而它也必然是一项深层的文化交流活动。语言和翻译都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也就必然受文化的影响，被文化所改变。

文化研究因其突破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一改翻译研究长期以来附庸于语言学或文学的状况，为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之合法性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大卫·卡坦（David Katan）在其专著 *Translating Cultures*（1999）一书中，一开始就提出传统的口笔译者新的角色定位应为“文化传播者”，接着讨论文化及其定义，介绍了文化的四个重要模式，即层级模式（Layers）、葱头模式（Onion Model）、冰山理论（The Iceberg Theory）和文化的三一模式（Triad of Culture），几个模式可以互相参证。Katan 从知觉和元模式理论出发，阐述影响现实感知的几个过滤器（filters），将元模式作为分析知觉与意义的一种工具加以引进，并结合实例说明语言是如何既作为交流手段又对其加以限制的。他认为，每一种文化对同一片森林有着不同的表述，因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总是有所选择，这一选择就使得我们不同于其他人。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模式包括以下三个必需的基本变化：普遍化（generalization）、变形（distortion）及省略（deletion），对应于文化理论家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的“人类独具的认知三平面”（即感知过滤器）。另外，要加上语言这一过滤层，因为语言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一个要素。这给译者对源语文化进行解构，及在译入语中进行文化重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照。在本书最后，Katan 还提出了“高语境交际”（high context communication）和“低

语境交际”(low context communication)两个文化定位概念。前者的极端(如日本文化,还有中国文化)认为沉默胜于语言,话语拐弯抹角;处于另一极端的瑞士-德国文化则注重准确、详尽和直截了当。因此,在文化翻译/传播中怎样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成功达到预期的情感交际目的,是译者/传播者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

随着西方翻译研究逐渐开始向文化转型,传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观念逐渐受到质疑,人们开始对翻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开始质疑“等值”是否真是翻译的前提和翻译的目标。(Bassnett, et al., 1990: 6)不少翻译理论家认为,与其永无休止地争论“忠实”、“等值”这些先验性的标准,不如客观地考察译文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形成动因,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对翻译政策、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制约,以及特定译著对接受文化产生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语言活动,文化的方方面面会根据当时的文化接受状态以不同的程度作用于翻译的过程,介入译者的逻辑判断和语言选择。因此,研究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会揭示出很多文学派和语言学派译论所没有或难以揭示的方面,从而使译者对翻译实质的认识不至流于片面,失之偏颇(王东风, 1998)。翻译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交流,正如 Hatim (2001: 61) 所说:“翻译研究中的趋势明显是朝文化转移而不是朝语言转移,这包括把翻译过程视为一个交流的过程而不是语篇之间的语码转换……”因此,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研究翻译中的种种问题,他们“超越语言,把焦点放在翻译和文化的互动以及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限制上……”(Munday, 2001: 127)

英国著名当代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Newmark, 2001: 95)将文化分为以下5类:①生态;②物质文化:食物/衣服/房子和城市/交通;③社会文化:工作和休闲;④组织、习俗、活动、过程、概念:政治及行政/宗教/艺术;⑤手势和习惯。而卡坦(Katan, 1999)主要是借助 Dilts 的逻辑分层(logical typing)来对文化进行划分,Katan 的文化分类包括:①环境;②行为;③能力/策略

/技巧；④价值观；⑤信仰；⑥身份。Katan 的分类同纽马克的分类是基本一致的，只是表达不同。如 Katan 的环境这一层次实际上是涵盖了纽马克的生态和物质文化两个类别及第四个类别中的一部分。文军等（2005）在 Katan 文化划分的基础上探讨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问题，研究包括：①有哪些文化因素可能介入翻译过程；②这些文化因素是怎样介入翻译过程，从而影响译者的决定。结合翻译活动的特性和翻译过程的特点，通过实验论证得出结论：翻译过程是一个有文化介入的多层次的互动过程。这一复杂过程涉及到认知、心理、文化等多方面。在翻译过程中涉及的文化层次主要与译者的个人经验有关。

刘宓庆（2007）认为，21 世纪翻译理论研究将面对许多新问题、新任务。最大的问题（也是人们最广泛的关注和兴趣）将集中于文化翻译。谢明指出，“中国翻译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翻译背后的动机和目的，译者有意识或默默面对的局限，翻译前、中、后进行译介和调适的渠道和路径，以及译作将要嵌入何种阐释的文化架构”（Xie ming, 2007: 29 - 30）。

## 第二节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兴起，在尤金·奈达、穆南、卡特福德、雅各布逊、费道罗夫、巴尔胡达罗夫、彼得·纽马克等为代表的欧美语言学家看来，翻译理论只能是一门语言学学科，翻译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语言学的任务，重要的是对比原作和译作语言单位意义上的相同，以达到内容上的等值；把接收到的语言信息根据给定的定义译成信号，然后发给目标语读者；一切与语言内部结构无关的因素也被排除在外，或忽略不计。因此，语言是透明的，翻译是一种纯语言的转换过程，所涉及的只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这样，翻译研究就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语言学转向强调用所谓的规律性的对应现象限制译者发挥创造性，把翻译视为一门

精确的科学，集中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和语言形式的转换，从而归纳出一些诸如语态转换、词性转换和增词之类的所谓翻译规则，企图以这些机械化的手段达到最大限度的对等——字句对等，注意寻找语言转换规律以及语义的对等模式，迷信语言的共性，认为用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这种翻译观所依靠的是认识论主体哲学，并深受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认为原文具有确定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因而在翻译中译者的地位逊于原作者的地位，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其作者，把再现原文的确定意义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以求得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等值。翻译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成了探讨不同语言之间在形式上的转换规律，语义-句法模式就成了主要的研究模式。翻译者的任务只是按语言规律去解码与编码，整个翻译过程被简单化、机械化、程式化了，而起作用的只是语言的工具理性，即其规律性。翻译主要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因此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输入活动，译者应该尽量避免个人的主观评价和判断，忠实和透明的翻译是译者的最高理想。这种翻译思想贯穿于对翻译的定义中，例如“翻译是用一种语言中对等的文本材料来代替另一种语言中的文本材料”（Catford, 1965: 20），“翻译包括把源语信息用接受语中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传递出来”（Nida & Taber, 1969: 12）。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1997: 167）中“翻译”的定义为：“翻译是语言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把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内容变为另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过程或结果，或者说把用一种语言材料构成的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出来。”这种定义概括了整整几代人对“翻译”活动的传统认识，把忠实传达作者的原意作为首要和最终的目的，而使人忽视翻译的其他目的。

显而易见，早期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最大优势表现在研究高度规范化的语言方面，能提供许多范式以及使用标准形式的术语。然而，这种翻译研究范式太拘泥于原文的信息层，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视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忽视文本主题结构以及文本的话语和语篇结构，忽视更大范围的文化与这些因素对译文的生成和接受所产

生的影响；没有考虑语用维度、语用意义和文本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其研究范式是封闭的、静止的和自足的。

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也由语言本身扩大到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生理等方面，后期的语言学翻译思想把原作、原作者、原文读者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所以也就更科学、更完整地描述了翻译过程，突破了微观语言学的文本模式，开始关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受后解释哲学、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想的影响，翻译研究的方向开始转向文化研究而不是语言转换。巴斯内特、勒菲弗尔、图里、韦努蒂等为代表的“文化转向”学者开始关注翻译中语言结构外的诸多因素：哲学、政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译者目的、诗学等，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从着眼单一文本转向文化大视野。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文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文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文社会的政治、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然，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描写译学把研究的重点从语言形式的转换转移到翻译在主体文化中的功能及运作过程，第一步就是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义。“任何在译入语系统中以翻译形式呈现或被认为是翻译的文本都是翻译”（Toury, 1982: 22 - 39）。根据这一定义，各种形式的译本甚至伪译、各种目的的翻译活动都可以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文化学派还从不同的视角对翻译的性质进行了论述。勒菲弗尔（Lefevere, 1985）认为，翻译和文学批评、剧本改编、文学史和历史书一样，也是一种“改写”过程，因为它们都是对原本的一种操作。任何形式的改写都有其特殊目的，文学翻译的目的则往往是为了推动译入语文学朝着某一特定的方向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的翻译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摆脱多元系统理论，而更关注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罗宾逊，2007；Tymoczko, 2004）。玛丽亚·托莫茨

科 (Maria Tymoczko, 2000) 指出, 翻译是一种转喻过程 (metonymic process), 是将源语作者、文本和文化嫁接入主体文化的过程; 转喻体现的局部性质 (partiality) 不仅仅是对原作的偏转和遗漏, 它更多地体现了翻译的功利性, 以便加入主体文化的权力对话, 成为当时的政治话语和社会变动策略的一部分; 译者对字、词的选择, 对原文的删改和取舍以及序言、注释、评论等无不反映出翻译的功利性。翻译的文化研究作为当代翻译研究范式的总体趋势, 具有较强的优势, 同时反映当代学术理论思潮的要求。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带来的译学观念变化, 按照德国译论家斯内尔·霍恩比 (Snell Hornby, 2001: 23-35) 的观点, 表现为传统的两分法思维方式 (形式/意义、直译/意译、源语/译语、作者/译者) 让位于整体的、格式塔式的、随具体情况而变化的思维方式; 译语文本不再是对原著一字一句严格对应的临摹、复制, 而是由一定情境、一定文化的组成。文本不再是静止不变的语文标本, 而是经读者 (译者) 解读后, 在译语文化语境, 以译语实现的创造性和艺术性的再现。

“忠实”向来是主宰中西方翻译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 意即指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的对等关系。这种以追求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对等, 将翻译看作单纯的代码转换 (transcoding) 过程的语言学模式是传统翻译理论的主导模式, 同时也成为备受争执的焦点。许多西方翻译家 (Bassnet, 1991; Chesterman, 1997) 对这一概念表示了质疑。翻译的文化研究范式表现有二: (1) 以源语文本为中心转向以译入语文本为中心; (2) 在翻译培训的模式中既包括了语言因素, 同时也将文化因素考虑在内 (Gentzler, 2001: 70)。在这一译学研究新范式旗帜下, 出现了许多新的翻译理论, 如多元系统论、目的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起主宰地位的不再是源语文本及其特征而是将翻译看作目标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 将翻译与宏观语境相关联 (Snell Hornby, 1991: 15)。

文化转向跳出了传统的译论狭隘的操作层面, 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 对译学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 文化学派的文化转向抛开翻译中的语言问题, 或干脆用文化研究代替语言研究的问题, 取代语